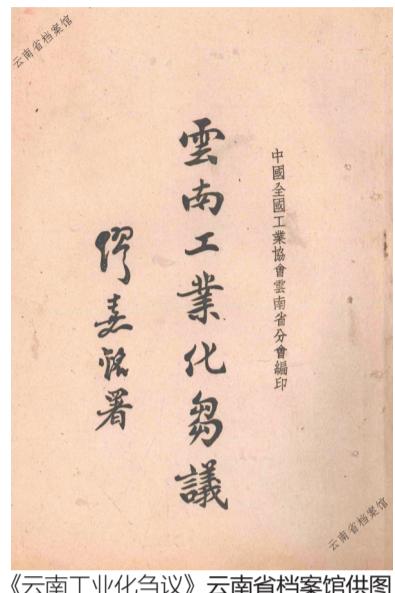


缪云台的《云南工业化刍议》： 历史智慧与当代回响

杨萍



《云南工业化刍议》云南省档案馆供图

缪云台(1894—1988)，原名缪嘉铭，云南昆明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金融家、政治活动家和民主爱国人士。作为云南省首批公费留美学生，他学成归国后矢志于实业救国、富民兴滇，成为推动云南经济近代化的核心人物。

《云南工业化刍议》(以下简称《刍议》)是1946年缪云台所著，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云南省分会编印，对云南近代的经济环境、资源、工业化步骤、工业化重要性及如何实现作了精炼的概括，短短的几页让人一目了然，他主张发展交通、电力、工业及民营企业来推动云南工业化发展。

历史背景：抗战带来的特殊机遇与战后转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重大历史变局深刻改变了云南的经济地理格局。为保存抗战实力与工业基础，国民政府将中东部地区大量关平国民计生的骨干工业企业内迁至云南，随之带来了宝贵的建设资金、机械设备、先进技术和工业人才。与此同时，大片国土沦陷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西迁避难，形成了庞大的战时消费市场，军需民用物资需求极其旺盛。

这一时期迁入云南(尤其是昆明)

的工业企业，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官营企业为主，辅以部分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多集中于军工、机械、冶金、化工、电力等重工业领域。它们的到来与建设，一方面生产了大量军需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直接催生和促进了云南本土近代工业的兴起，初步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雏形，为云南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形势急转直下。随着东部沿海工业基地和港口的迅速恢复，云南失去了战时国际交通枢纽和战略大后方的独特地位，国民政府的工业建设重心随之东移。抗战期间因应战时需求而“井喷式”发展的许多工矿企业，由于缺乏长远的产业布局和基础支撑，很快陷入萎缩。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缪云台怀着对云南前途的深切忧虑，撰写了《刍议》。他敏锐地指出，云南工业不能因战时特殊条件的消失而“听其自生自灭”，必须谋划长远、固本培元，为西南建设奠定百年之基。

《刍议》的核心观点与战略构想

《刍议》开宗明义，高度概括了云南的战略区位与资源禀赋：“滇省屏障西南，接壤缅、越，北临川、康，东控黔、桂，为国防重镇，土地空旷，气候温润，林畜茂盛，矿藏丰富。经济上可称得天独厚。”基于这一基本判断，缪云台以其留学海外所获得的现代视野和多年主政云南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套系统而务实的工业化方略：

一是交通建设是一切工农业之根本。缪云台深刻认识到现代交通是工业社会的“动脉”。他分析指出，云南河流湍急，水运之利甚微；公路修通适合短途，长途则成本高昂，困难重重。因此，发展铁路交通被确立为“工矿建设中首要之图”。他认为，只有铁路网路畅通，才能使“工业动脉流畅”，实现“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进而带动工业农业全面繁荣。他明确提出应“藉铁路以发展重工业，利用钢铁以畅交通”，将铁路建设视作云南工业化的基石与先导工程。作为云南经济建设的实际主持者，他虽非具体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却通过成功的金

融改革与实业经营，为滇缅铁路等重大交通项目的筹措与推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金保障与战略支持。

二是因地制宜，发展植根本土的现代工业。缪云台始终坚持立足省情、务实发展的原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主持个旧锡务公司时，他便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革管理、开拓国际销售渠道，将个旧锡业从传统的土法生产提升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产业，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1934年，他倡导成立了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并以此为核心平台，主导投资兴建了涵盖纺织、五金机械、钢铁冶炼、电力、金融、农田水利等领域的55家企业事业单位，开创了云南有计划、成体系推进工业建设的先河，其中许多企业成为云南现代工业的摇篮。抗战期间，他更是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内迁带来的技术、人才与资金，推动建设了电气炼钢厂、云南酒精厂、云丰造纸厂、云南水泥厂、裕云机器厂等一系列关键企业，发展蚕丝、茶叶(滇红)即诞生于此时期)等特色产业，既有力支援了抗战，又极大增强了云南自身的工业实力。

三是优先开发电力，奠定能源基石。缪云台高度重视能源，尤其是水电对工业化的基础性作用。他对云南的主要河流进行了全面勘查与潜力评估，指出云南虽乏舟楫之便，却拥有全国罕见的优越水力发电条件。他详细列举了螳螂川、澜沧江、怒江、元江等河流的水电开发潜力，预见性地提出“将来普遍开发，则电网可联系全省”。他不仅将水电视为工业动力之源，还前瞻性地提出了“电力灌溉”以促进农业的构想，体现了综合开发的远见。

四是大力鼓励与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在缪云台主政云南经济时期，民营工商业曾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刍议》中，他明确主张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凡有国营必要之事业拟请政府迅速举办，其可以民营或归应民营者由政府切实奖励并竭力保障。”他特别建议，对于符合工业化方向的民营厂矿，应在器材进口税、营业税、所得税等方面予以减免，以政策杠杆引导社会游资投向实业领域，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在他的推动下，云南的纺织、五金、制药、食品加工等民营行业一度蓬勃发展，形成了官民互补、共同繁荣的局面。

历史意义与跨越时代的对话

《刍议》不仅仅是一篇理论文章，更是缪云台在云南多年实业救国实践的总结与升华。它所倡导的立足本土资源、注重基础设施、坚持务实渐进、倡导官民协力、关注民生改善的发展哲学，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与省情的、稳健而富有生命力的工业化道路构想。尽管因战后国内形势剧变，内战爆发，社会动荡，缪云台的许多宏伟蓝图未能在那个时代完全实现，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却历久弥新。今天，当我们回望历史，可以发现《刍议》中的许多战略预见，正在新时代的云南以新的形式变为现实，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关于交通：昔日缪云台梦想的“国际大通道”，今日已由中老铁路、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等现代交通网络部分实现，云南正从祖国的西南末梢转变为面向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关于资源转化：昔日依托锡、铜等矿产资源，今日云南利用丰富的水能、太阳能建成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并将绿色能源优势转化为绿色铝、绿色硅等先进制造业优势。

关于电力：昔日系统规划的水电开发蓝图，今日已在金沙江、澜沧江上建成世界级的水电基地，全省水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前列。

关于特色产业：昔日发展的茶叶、猪鬃加工，今日已升级为覆盖茶叶、咖啡、花卉、坚果、中药材的高原特色农业体系，正向“绿色食品品牌”国际化迈进。

关于民营经济：昔日倡导扶持民营经济的理念，今日已结出硕果，民营经济撑起云南经济的“半壁江山”，各级政府对标先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正吸引着各方投资者。

缪云台先生和他撰写的《刍议》，是云南近代化历程中一座重要的精神与思想丰碑。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今天，重温这份历史文献，汲取先贤智慧，对于我们坚定发展自信、把握历史机遇，走好符合省情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缪云台留给云南的，是一笔超越时代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云县知事张肇兴： 勤政爱民 廉洁奉公

刘鸿燕



20余丈，为铁索吊桥，横于南河之面，结构坚固，状似奇而得法，命名“庆云桥”。庆云桥的建成，终使天堑变通途，从此交通往来畅通无阻。在张肇兴调离云县后，云县人民为缅怀其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之高风亮节，在庆云桥东岸建“清官祠”，并塑其像，定期祭祀，将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东岳庙会”改为“清官会”，在祠前办会纪念，会间弹弦举乐，香花致祭。此次，他积极倡导文教，修葺名胜古迹。张肇兴博学多才，尤喜诗文，闲暇之余喜与地方人士聚会于琴山诗酒唱和，随后他便以此为基础，倡导组织了地方文学团体“鸣琴学社”，赋诗作文，每月会课两次，存下《云州诗稿十卷》。后诗社又进一步发展为学术评议会，留意于经世学术，间或提出有关时事论题，撰写论文。张肇兴还倡修县志，亲聘大理文人李学海前来协助编写，完成天文、地理、建筑、食货、人物等志稿10篇，其中天文、地理、建筑等篇由张肇兴亲自撰写。此外，他还修葺名胜古迹云章楼、文庙、武庙、景星阁、明德门；增建逍亭、济亭、虚亭等处；创立节孝祠，设女学于其中。

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张肇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云县任职三年，他不顾其家，不私其身，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主持修建南河铁索桥时，除亲力亲为、竭尽全力外，为倡导富商巨绅捐款以筹资建桥，他带头从自己月俸中节省出五百大洋捐于建桥工程之中，并自备盘缠，不辞劳苦徒步亲赴昌宁押运大块铁链。修建节孝祠时，经费不足，张肇兴捐出自己的私人藏书，委托劝学所出售，所得之款用以添补修建费用，节孝祠得以顺利建成。张肇兴任云县知事三年，1918年奉调任维西知事，“当其去也，清风两袖，震及藏书以作川资。沿途香花祖道，不忍别去”。张肇兴任维西知事数月，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又适逢境内瘟疫流行，染疫殁于任上，享年46岁。遗体回葬大理苍山小斜坡。云县人士闻耗，遂派出劝学所所长张世卿等人赴大理吊唁，只见其家尽是孤儿寡母，室中空空如也，贫困至极，家中仅有的可资避风挡雨和勉强糊口的微薄家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没有一件是张肇兴为官时所置；到坟地祭奠，但见三尺孤坟，荒草乱石，未立碑石。跪拜的张世卿一行数人恸哭得起不了身，一连数日面露泪痕。张世卿一行回县如实禀告，云县人民无不为之动容，先后四次派人携款到大理慰问其孤女寡母，凑集起1400元大洋为张肇兴竖碑立墓，撰写墓志，挽以联曰：“救时经济，名世文章，合循吏儒林为一传；殖吾田畴，海吾子弟，问前清民国有几人？”并聘请其女张静兰到云县女子小学任教。由此可见，云县人民对张肇兴深深的感念之情。

勤政爱民、鞠躬尽瘁。张肇兴在任云县知事三年的时间里，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兴利除弊、倡导文教，鞠躬尽瘁，政绩卓著。他尽心竭力地兴利除弊，云县面貌为之一新。首先，他积极兴修水利、路桥等基础设施，便民、利民。他亲自勘察并主持兴修南箐河大沟，引南箐河水绕城向北而东，灌溉农田。又沿河道利用南箐河大沟水力兴建碾坊两座，加工稻米，集其收入用以水利维修，不辞挪用，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引沟入城，使旧有的云县消防设施和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其时，云县境内道路崎岖，他督工平治，更主持修建了造福云县、功德无量的南河铁索桥即庆云桥。张肇兴赴任之初，悉知南河年年水患，每年雨季暴涨，冲毁桥梁，商旅断绝，行人强渡，往往溺死。于是召集邑人商议，兴建铁索桥，商定富者捐金、贫者出力，矢志不移。1915年，张肇兴趁千季水落积极筹划建桥事宜。从造型设计、筹资备料到组织施工各个阶段，他都亲力亲为，事必躬亲，每日必亲到现场视察督促，及时解决工程中的各种问题。南河铁索桥于1915年12月兴工，1917年3月建成开桥。桥长

明代嘉靖朝“大礼议”事件对云南的影响

彭倩 冯秀英

发生

在嘉靖朝的“大礼议”(又称“议大礼”)，是明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对

其后的道德政治和礼制文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明正德十六年(1521)，明世宗朱厚熜即位，随后围绕其父生尊号问题，拉开了一场既是学术之争、又是政治之争的序幕：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且无子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明史》卷17《世宗纪》，迎武宗弟朱厚熜继位，朱厚熜登基后，坚持尊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皇考”(宗法意义上的父亲)，并追封帝号；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则主张遵循“继统必继嗣”的传统礼制，要求嘉靖帝认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生父称“皇叔考”。双方僵持数年，其间爆发左顺门百官跪谏等激烈冲突，嘉靖帝对反对者施以杖刑、贬谪、削籍等严刑打压，最终获胜，此为史上著名的嘉靖朝“大礼议”事件。照理说，事情发生在朝堂，似乎与远在西南边地的云南关系不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其一，多名云南籍人士直接参与了“大礼议”事件。杨一清，字应宇，祖籍安宁，是明代云南籍官员中唯一入阁拜相的重臣，历经四朝，在“大礼议”时是内阁首辅身份。他未盲目站队，而是站在折中的立场，采取温和的态度，提出“礼仪可议，国本不可摇”，试图在嘉靖帝和反对议礼的文官集团之间寻求平衡以缓和矛盾。《明史》卷198有载，杨一清“于时政最通练”、“博善权变，尤晓畅边事”，却因不附和张璁、桂萼等人而被倾轧，导致与明世宗离心，嘉靖八年因病去世。毛玉，字国珍，后更字用成，云南右卫(今昆明)人，《明史》卷192有传，毛玉“伏阙争‘大礼’，下狱受杖，竟卒”，他同杨慎等官员于左顺门伏跪哭谏，受廷杖致死。李元阳，字仁甫，太和人，因“大礼议”贬谪江西分宜，晚年“家居四十余年，精研治理”，勤于著述，留下诸多描绘云南风貌的名作。缪宗周，号碌溪，通海人，康熙《通海县志》卷6记其“以议大礼廷杖”，时任户部主事的他，不畏强权、冒死直谏。天启《滇志》卷14记曰：“所至皆有宦迹。里居三十多年，绝迹公庭，清约如寒士，寿逾八岁，蒙存向焉。”晚年归隐通海，八十五岁善终。这些云南人积极参与朝政，在事件中的直谏行为和宁折不弯品质，使云南官员在朝堂上赢得“忠直敢言”的声誉，为后世云南士人树立了典范，“大礼议”后，更多云南士子关注国家政治，参与科举与朝政，扩大了云南籍官员的

政治参与度。其二，几名重要人物因“大礼议”事件与云南结下深刻渊源。非云南籍但与云南联系深厚的杨慎、何孟春等人物的行动，从政治治理体系、社会民生基建、文化学术发展等多个维度，对云南社会影响甚大。杨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明史》卷192有《杨慎传》，杨慎因反对嘉靖帝听取桂萼、张璁等议言，偕同其他官员上疏进言，被皇帝斥责、停俸，再次疏谏失败后，又因与百官在左顺门伏跪哭谏而被廷杖两次，贬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时任修撰一职的杨慎发出“国家生士百五十年，杖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呼声，可见其气节和为人。谪戍云南三十多年间，杨慎关心民瘼，积极参与国家与地方事务，例如“闻寻甸冤钦，武定凤朝作乱，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守臣击败贼”，针对永昌石开办采中官府与官吏盘剥百姓而造成“石祸”之事，他创作《宝井篇》揭露采宝对百姓的压榨，与好友张含所作《宝石谣》相呼应，发声呼吁关注民生，通过他的影响力间接对当地不合理的采宝贡赋制度形成舆论制压；针对滇池海口频繁疏浚而劳民伤财的问题，杨慎致信云南巡抚直陈利害，成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推动改善地方治理，也留下《海口行》、《后海口行》等名作。何孟春，字子元，湖南郴州人，“大礼议”事件发生时，他仍在云南巡抚任上，他反对“议礼”，上疏有言“为人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私亲”(《明史》卷191《何孟春传》)，因“倡众逞忿”、伏阙争谏而被夺俸，后又被贬为南京工部左侍郎。

其三，“大礼议”事件直接或间接影响云南社会文化发展。包括儒学的发展、人文景观的形成、文化的振兴等。发展儒学，推动书院建设。杨一清对云南文化的影响集中于精神引领与文学风气带动方面。他与云南籍人士交往密切，曾与“大礼议”中反对嘉靖帝主张的云南人毛玉多次唱和赠诗，其人格与文学理念对云南士人形成道德教化。他嘱托杨慎到滇后多讲学育人，间接推动中原学术思想传入云南，促进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与发展。杨慎谪居云南时，主要在安宁州讲学，云南巡按郭楠为其修葺书院，提供讲学场所，而在昆明高峣的讲学场所，成为滇中文化传播的重要之地。从云南走出又回归云南的李元阳，隐居家乡大理

唱之风兴盛。在交游往来间，他编撰《滇程记》、《滇载记》、《滇候记》、《云南山川志》等，系统记录云南风物，开创地方史研究先河。杨慎《席上》诗中“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成为昆明“春城”雅号的来源，增添了昆明的城市文化内涵。杨慎的游记、李元阳的方志系统记录云南地理、经济与民俗，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和文献编纂奠定滇文化的典籍基础，为后世研究西南边疆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弘扬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发展。李元阳长于研究云南民族历史，将民族分为僰、爨两类，提出“白人非夷”观点，为民族研究提供新视角。一般认为，杨慎创作了《南诏野史》，保存了云南珍贵民俗资料，实现了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形成了兼具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特色的包容多元的地方文化新形态。

总之，“大礼议”这场政治风波，不仅改变了几位云南籍士人的命运，还意外促成了明代几位重要文人结缘云南，他们形成一种精神和思想场域，在云南的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他们在逆境中坚守文人风骨和文化志趣，不仅塑造了非凡的个人命运，更深刻影响了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大礼议”事件成为促进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交融，推动云南政治、社会、文化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

(作者分别系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授)



本组图片均由云县党史研究室董锡宏收集整理